

审计师声誉研究：述评与展望^{*}

王 帆 张龙平

(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 31001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430073)

【摘要】审计师声誉是审计师保持独立性的动机，对审计师声誉的研究在2001年安然事件后逐渐增多并引发了广泛关注。现有文献主要从审计师声誉的形成、作用、毁损与修复机制等方面展开。具体而言，监管、行业专门化、审计质量、媒体及法律等是审计师声誉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审计师声誉的建立有助于审计师保持独立、提高审计质量和收费等，而审计师声誉的毁损将会导致市场反应和溢出效应，同时也催生了相应的声誉修复问题。本文的综述有助于全面了解审计师声誉的现状并可能对其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建议。

【关键词】审计师声誉 声誉机制 安然事件

早在美国职业审计发展初期审计界就开始关注声誉问题。1890年普华在美国纽约百老汇成立分所，路易斯·大卫·琼斯被任命为经理，虽然琼斯具有丰富经验且做事认真，但远在英国伦敦的合伙人仍不希望该事务所的声誉与琼斯个人声誉产生混淆，甚至担心未来他的个人行为会影响事务所声誉，所以不准他对外公开使用事务所的名字执业，只能以他自己的名义执行审计业务。然而，随着事务所规模的扩张与审计业务的复杂化发展，声誉毁损事件不断发生并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如2011年发生的中国东南融通财务欺诈事件就使德勤的声誉受到损害，甚至Oppenheimer & Co. 的分析师格林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对德勤审计的财务报表不太信任，因此下调了德勤审计过的其他两家中国IT服务企业的投资评级。但这两家公司没有被指控有任何过错，也没人指控德勤有错^①。近年来，审计师声誉也引起了我国审计实务界的高度重视，2007年的“做大做强”战略为我国事务所建立品牌声誉提供了潜在可能，2011年9月中注协发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更是明确指出我国事务所应“大力创建自主知名品牌”，但国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对国内外审计师声誉的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从事务所通过建立自主品牌实现“做大做强”提供理论支持。

一、审计师声誉研究框架

根据国际审计准则，审计师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审计师指审计师个人，广义的审计师既包括审计师

个人又包括事务所，而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与声誉有关的审计师主要指广义概念。因此审计师声誉是社会公众及利益相关者对事务所与审计师个人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职业道德规范活动的整体认知与评价。首先，审计师声誉是一种认知和评价，属于主观范畴，做出这种认知和评价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即客户、股东、债权人等）；其次，认知和评价的客体是事务所与审计师个人履行投资者利益保护和维护道德规范的活动。声誉的概念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商誉、名誉、品牌等。其中在管理学领域与声誉涵义最接近的是“品牌”，但品牌与声誉并不完全相同。声誉通常被看作是对驱动品牌权益贡献的“有差别回应”资产之一，并且品牌的范畴比声誉要窄，它是支持并与一个单一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即顾客）发生互动，而声誉是与多样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Aaker, 1996）。但品牌建设 with 声誉形成密不可分，声誉是建立品牌的必要条件，而品牌是声誉的外在表现，因此与审计师创建品牌有关的研究必然会溯源到声誉形成的问题上来。

国内外对于审计师声誉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在具体地介绍文献之前，我们对其所涉及的领域进行总体性概述，具体体现在图1的框架之中。如图所示，本文将从审计师声誉在时间维度上经历的动态过程分如下三个部分进行梳理：审计师声誉形成机制，审计师声誉作用机制，审计师声誉毁损与修复机制。

* 本文是张龙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利益保护导向的中国环境审计体系创新研究”（11&ZD04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2011. 中国概念股风波损害“四大”声誉. 详见 <http://cn.wsj.com/gb/20110712/bch114317.asp>, 2011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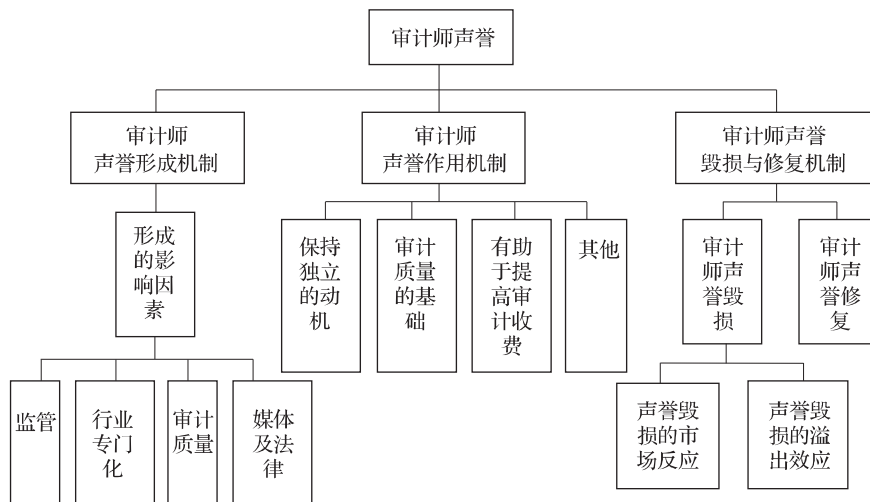


图1 审计师声誉研究框架图

二、审计师声誉形成机制研究

审计师声誉能够增加审计服务供需双方的价值，掌握其形成规律将有助于事务所建立较高知名度的品牌。从现有文献来看，对审计师声誉形成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上。影响因素存在于审计师声誉形成的各个方面，它是事务所建立品牌声誉的关键内容。然而直到最近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重视影响因素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监管、行业专门化、审计质量、媒体及法律等方面。

一般认为受到监管方惩罚的审计师将会遭受声誉破坏，从而引起经济损失（Firth, 1990; Rollins and Bremser, 1997; 方军雄, 2010），该规律扩展了先前关于“审计师声誉有品牌价值”的研究范围。而张奇峰（2005）从加强监管对声誉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采用公司市场价值与盈利能力的相关系数对声誉进行衡量后发现在首次获得IPO专项复核资格的事务所中，投资者并不认为本土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盈利更可信，相反他们更相信声誉较高的“四大”，即他认为仅靠政府对供给方的管制并不能提高审计师声誉。

事务所行业专门化是影响审计质量和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陈丽红和张龙平, 2010），也是提高审计师声誉的原因之一。Francis等（2005）把行业专长分为国家性和地区性专长后，发现只有“五大”同时具有国家性和地区性专长才能获得19%的声誉溢价，这表明国家性和地区性专长共同影响了审计师声誉和价格。此外，一些研究从审计师选聘的角度证实了行业专门化对声誉的重要性。GAO的一份报告曾经声称80%的企业认为行业专门化是他们选聘审计师时重要考虑的内容，这是因为行业专门化代表了审计质量和审计师声誉（GAO, 2003）。随后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如Lee等（2004）与Hertz（2006）在分别研究独立审计委员会对审计师选聘的影响与SOX法案对审计师选聘和解雇的影响时，均发现具有行业专门化的审计师更容易被聘请，且具有行业专门化比不具有行业专门化的审计师更可能采用辞职的方式来保护他

们的声誉。

声誉是一种市场机制，但它依赖于消费者考虑到的产品不可观测特性（质量）的可获得信息（Toth, 2008）。Toth采用模拟安达信灭亡的实验证实了上述假说，他发现安达信客户依据审计质量（以财务重述为替代变量）成功的选择了具有高声誉的审计师。另外，Skinner和Srinivasan（2010）研究了普华永道日本分所（ChuoAoyama）对嘉宝公司的审计失败事件，发现当ChuoAoyama的审计客户在其审计质量的问题日益凸显之时更换了审计师。他们认为在法律不起主要作用的环境中，审计质量对审计师声誉更为重要。

此外，有研究显示媒体和诉讼也影响了审计师声誉。Peurseem和Hauriasi（2000）通过在大众媒体上查找与专业审计师有关的文章，发现在重大事件中媒体根据事件进行的报道加强了审计师客户的市场反应。而McCracken（2003）采用实验法发现诉讼不仅会给审计师带来诸如损害赔偿、防御这样的直接成本，也会带来损害声誉这样的间接成本，但为了避免更进一步诉讼，有声誉的审计师仍会采取诉讼而不是庭外和解的战略。

三、审计师声誉作用机制研究

声誉给予审计师保持独立的动机（Bengtson, 1975），树立一种发现和报告违约行为的业绩与声誉需要高昂的代价。但一旦树立起来，这种声誉就可增加对审计服务的需求和他的服务报酬（Watts and Zimmerman, 1986）。Krishnamurthy等（2006）以安达信的全部客户为研究样本，调查了在2002年3月14号安达信被起诉后的声誉恶化是否对客户感知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他们发现当市场认识到审计师的独立性被威胁时，起诉期的异常报酬率更加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支持了审计师声誉对独立性有重要影响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利益相关者发现审计师的独立性比预期的要差，审计师的声誉就会遭到破坏，其客户的市场价值将会遭受损失，随后便会导致客户的流失或收费的降低。

审计师声誉是审计质量的基础。漆江娜等(2004)以经审计的盈余质量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直接检验了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较高声誉的“四大”审计的公司可操控性应计略低于本土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此外,Bugeja(2006)使用事务所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了市场对高声誉审计师审计质量的认可程度,他发现在年初宣布收购且目标公司由声誉较高的“四大”审计时,股东将获得更高的收购溢价。随后Weber等(2008)与Gao(2010)分别以ComROAD公司的会计丑闻及科隆案件为背景,从反面验证了市场认同声誉是审计质量的基础。研究发现毕马威的客户维持3%的负异常报酬率,而德勤的客户遭受了4.4%的负异常收益,且审计质量要求更高的公司有更多的负报酬率,可见市场降低了对声誉受损审计师审计质量的认可程度,他们的结论均证明了市场可以通过观察审计师声誉来了解审计质量,并对客户股价产生影响。因此为了保持客户并获得未来的“准租”,大事务所(声誉相对较高)具有更多的动力出具较高质量的报告(DeAngelo,1981)。

审计师声誉有助于提高审计收费。Allen T等(1996)与Bandyopadhyay和Kao(2001)分别以澳大利亚审计市场由于广告和营销专业化规则的调整以及审计招标的广泛引入导致的价格竞争加剧和以1991年安大略省修订第86条与审计师任命条件有关的法案为背景,研究了在没有垄断或寡头垄断租金的情况下,“六大”(或“八大”)事务所比非“六大”(非“八大”)事务所仍然存在审计费用溢价的现象,他们认为“六大”(或“八大”)的审计费用溢价是由品牌声誉引起的。类似地,李连军和薛云奎(2007)以我国分散的审计服务市场为基础研究了声誉溢价现象,研究发现相对于中国本土除前“五(四)大”以外的事务所,“四大”在中国分所的声誉溢价达到23.12%;相对于本土其他所,本土“五(四)大”事务所溢价幅度达到7.57%,他们认为我国本土事务所的声誉机制正在形成。然而审计费用的声誉溢价并不是无止境增加的,McLennan和Park(2004)采用实验法构建了两种技术相同但声誉不同的审计师模型。他们发现虽然声誉好的审计师收取较高的费用,但当声誉好的审计师数量增加时,其收取的溢价最终会降低,这削弱了他拒绝贿赂的动机。那么产生声誉溢价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表明聘请知名度较高的审计师能使公布的会计信息更可靠,从而减少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1976);并且高声誉的审计师能够在诉讼中给投资人提供更多额外担保,他们还能够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审计师民事赔偿责任(Dye,1993)。随后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高声誉的审计师的确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Godbey and Mahar,2005; Hakim and Omri,2009; Kanagaretnam et al.,2010)、降低会计信息不确定性(Autore et al.,2009)、削减代理成本(Uang et al.,2006; Numata et al.,2010)和增加保险价值(Asthana et al.,2003),因此声誉越高的审计师越能够获得溢价。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表明审计师声誉有助于提高IPO

(Beatty,1989; Fang,2008; Batmini and Khalfallah,2009)、降低诉讼成本(Datar and Alles,1999)、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Fargher et al.,2001)、加强债务融资(Rodríguez et al.,2009)、促进公司业绩(Siala et al.,2009)及限制盈余管理(Kanagaretnam et al.,2010)等,但仍有某些问题学界尚存争议。如从与IPO有关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就很难在审计师声誉是否对IPO初始回报产生影响的问题上达成一致。Beatty(1989)检验了审计师声誉与IPO初始回报的关系,结果显示聘请高声誉审计师的企业比聘请低声誉审计师的企业获取了更低的抑价率,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初始回报。与Beatty的结果相似,胡旭阳(2002)与王兵等(2009)分别以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为背景研究了审计师声誉与发行抑价的关系,结果发现审计师声誉能够显著降低IPO抑价率,即使投资者获取了较低的初始回报。然而,Batmini和Khalfallah(2009)却提出高声誉审计师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较高的初始回报,他们以风险投资公司这一特定主体为样本,发现金融市场通过价格贬值来惩罚IPO的信息不对称,而风险投资者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试图通过聚集其他投资人的股份或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来增强他们的初始回报。但Fang(2008)分别采用分位数回归与最小二乘回归对台湾审计市场进行检验,却发现审计师声誉的不同替代变量对IPO初始回报的影响不同,且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差异很大。

四、审计师声誉毁损与修复机制研究

利益相关者只有在某一特定事件爆发时才认识到声誉毁损的确存在。以2001年的安达信倒塌为契机,国内外理论界开始采用事件法对声誉毁损进行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多从声誉毁损的市场反应及其溢出效应两个角度出发。同时与声誉毁损研究相对应的是声誉修复研究,这同样是从安达信倒塌事件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该事件的巨大轰动效应启发了理论界对审计师声誉毁损与修复的重新认识和进一步思考。

(一) 审计师声誉毁损机制研究

1. 审计师声誉毁损的市场反应

审计师声誉受损往往会带来负面的市场反应。当安然事件发生后,学者们主要围绕着2002年1月10日安达信宣布其销毁了与安然有关的资料并于2002年2月4日遭到美国司法部的刑事指控等事件(Chaney and Philipich,2002; Krishnamurthy et al.,2006; Nelson et al.,2008)研究了安达信声誉受损后的市场反应,但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Chaney和Philipich(2002)研究发现在安达信承认销毁安然文件3天后,它的其他客户经历了显著的负市场反应,这表明投资者降低了对其审计质量的期望。他们还发现由安达信休斯顿分所审计的公司在这一日遭受了更严重的负异常报酬率,但安达信遭受美国司法部指控后市场没有显著反应。随后Krishnamurthy等(2006)通过3个窗口检验了安达信662个客户的异常收益,其中两个窗口的研究结论与Chaney和Philipich一致,即安达信客户遭

受了显著的价值损失。但在第三个与安然遭受巨大市价损失有关的窗口,安达信的客户却没有遭受价值损失。此外他们还发现安达信遭受美国司法部指控后市场反应是负面的,这又与 Chaney 和 Philipich 的研究冲突。他们将此归因为样本差异和事件期间的不同。然而 Nelson 等(2008)与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完全不同,他们发现在安达信销毁安然档案时,新闻媒体披露了很多的行业负面新闻,特别是安然所在的能源行业。研究发现安达信能源行业客户的异常报酬率虽然是其他行业的近 2 倍,但与其他“四大”能源客户的异常报酬率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9/10 的行业中,安达信客户的异常报酬率都与其他“四大”客户未有显著差异。因此他们认为安达信客户股价的下跌不仅与声誉毁损有关,更可能是由于综合原因导致的。由此可见西方的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安达信声誉受损对客户股价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客户股价的角度出发推断审计师声誉效应的,但是股价的波动受到很多综合因素的影响(王兵、刘峰,2010)。

在安达信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审计师声誉,诸多事件得到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如 Weber 等(2008)研究了德国的 ComROAD 公司的会计丑闻对毕马威客户的市场反应; Numata 和 Takeda(2010)验证了日本嘉宝会计欺诈案对普华永道日本分公司客户的市场反应;方军雄等(2006)与朱红军等(2008)分别以“银广夏”和“科龙电器”作为切入点研究了中天勤与德勤客户的市场反应。他们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当事件发生时市场对这些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审计师声誉受损的负面效应在许多国家得到了验证。

2. 审计师声誉毁损的溢出效应

上述研究发现当审计师声誉受损时,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其审计质量的质疑而引起客户损失。继而很多学者对此进行扩展研究,思考具有相似审计质量的其他审计师是否也会受到“牵连”、其客户是否也存在类似损失。Hecker(2006)和 Cahan 等(2009)从安达信的全球网络角度检验了声誉的溢出效应。Hecker 选择 Berardino(前安达信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国会承认安然审计中的判断错误这一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安达信的德国客户股票价格受到了该事件的负面影响,且对其他“四大”的客户股价也产生了较小的负面影响。而 Cahan 等的研究仍围绕着销毁安然有关资料事件和美国司法部的犯罪指控事件,结果发现安达信的其他国家客户在这两个窗口的累积异常收益显著为负,这表明安达信的声誉毁损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分所均存在溢出效应。

此外,一些学者将声誉溢出效应的范围从安达信扩展到其他“四大”。Doogar(2006)对此问题的研究较早,他发现在安然事件中,安达信及其他“四大”在审计师声誉削弱的时机与幅度均不同,因此他认为“五大”事务所的声誉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但不存在必然关系。然而随后的研究结论却与 Doogar 不同,Autore 等(2009)研究了安达信宣布销毁与安然有关的档案时,其他“四大”客户的

股价也存在下跌。他们认为安达信倒塌的市场反应为检验“五大”客户声誉的溢出效应提供了证据。Huang 和 Li(2009)进一步扩展了 Autore 等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安达信销毁档案期间,它的其他客户和其他“四大”客户都遭受了损失,但损失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其中休斯顿地区和能源行业所遭受的损失最多。

(二) 审计师声誉修复机制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告诫人们“玻璃、陶瓷和声誉都很容易破裂,而且永远无法弥补得完美如初”。富兰克林的话只有部分是正确的,的确声誉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会在毫无预警的前提下一夜颠覆。然而自 18 世纪以来,声誉的修复过程已经有了巨大改善,像安达信这样如此令人惊惧的覆灭是个特例,如今大多数丢掉声誉的公司都有机会修复他们的声誉(刘希平,2009)。他们的修复方法多种多样,如当麦克林公司遭受财务审计欺诈行为后采取建立一种以价值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用以重建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管理层及内部文化的信心;皇家壳牌公司在声誉受损后,通过任命声誉卓越的范德伟为首席执行官改进了决策工作及责任制重获声誉;网络泡沫破灭后花旗集团的声誉受挫,该集团分析师成为华尔街利益冲突和可疑交易的反面教材,随后公司通过让第三方参与进来的方法重获了声誉,即投资 2 亿美元用于全球财政教育计划。

尽管实务中声誉修复方法多种多样,但其理论研究并不丰富,也很少有人专门从修复角度对审计师声誉进行研究,这或许是因为声誉修复本来就是声誉形成的一部分。从现有文献来看,仅有 Krishnan(2004)的研究涉及到这个问题,他以 2002 年更换审计师到“四大”的安达信客户为样本,从盈余稳健性的角度考察了大事务所对审计师声誉的修复。研究发现与非安达信客户的盈余相比,更换审计师的安达信客户的盈余对与未来现金流量有关的坏消息不敏感,且在 2002 年安达信和非安达信客户的盈余稳健性都有所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安达信休斯顿分所客户盈余稳健性增加的更显著。该结果表明高声誉审计师试图通过一种及时的方式来劝说其客户识别坏消息,从而减轻其诉讼风险。因此,他认为审计师可以采取减轻诉讼风险和增强其客户盈余稳健性的战略来重建声誉。

五、审计师声誉的研究展望

自安然事件以来,审计师声誉的研究在国内外理论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与声誉作用机制及毁损机制有关的研究。但由于缺乏实证研究数据,声誉形成与修复机制研究较少,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框架。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尝试建立审计师声誉研究的统一理论框架。当前理论界对审计师声誉的研究并未形成统一框架,如审计师声誉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就很不全面,形成条件也不明确,作用机制及毁损与修复机制的研究更不系统。未来可按照声誉机制的各个部分分别建立理论框架,即先尝试建立声誉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而后继续探索作用机制及毁损与修复机制的理论框架构建。具体方法在审计师声誉形

成方面可采用企业声誉研究常用的问卷调查等方法全面了解影响因素,并可从合谋角度出发进行理论分析与实验研究以了解声誉形成的条件,等等。

第二,努力发掘不同审计市场与不同审计师的声誉影响因素或其集合。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他们的结论不能直接用于指导审计师建立声誉,这是由于:(1)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法律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审计师个体特征都导致声誉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不能统一定论,应根据审计市场环境进行具体分析。(2)学者们的实证研究多数仅涉及影响因素的几个方面,一些重要因素并未考虑,如内部治理、环境状况、社会责任及战略与领导力等。(3)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审计师”一词主要指事务所,仅少数实验研究中涉及审计师个人,但学者们未对“审计师”这一概念进行区分,这使得研究对象指代不明确,从而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认识偏差。所以未来可以结合调查问卷、案例分析及模拟实验等方法,并区分各种审计市场与各类审计师来分别分析其声誉影响因素及形成路径,并在今后研究中厘清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第三,未来宜从多个角度对审计师声誉毁损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采用事件法来检验审计师声誉毁损的市场反应,但由于研究所采用同一案例的不同事件及同一事件的不同窗口范围存在差异,因此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存在差异,而过大的差异往往会削弱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价值,今后可考虑从市场份额、收费、审计质量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并发掘其共性。

第四,今后应加强审计师声誉修复阶段的研究。声誉修复是公司声誉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应将声誉修复作为全新环节置于整个声誉塑造过程的突出地位(Ross, 2009)。但鲜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为了避免安达信的悲剧再次发生,未来可通过案例研究法从内部与外部双重视角分析并借鉴世界著名企业的声誉修复步骤及内部治理经验,同时可通过对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结果来观测审计师声誉的修复状况。

主要参考文献

陈丽红,张龙平. 2010. 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研究述评及展望. 会计研究, 11: 81~86

李连军,薛奎奎. 2007. 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声誉溢价与审计质量的经验研究. 中国会计评论, 11: 401~413

王兵,刘峰. 2010. 安达信倒塌: 研究发现了什么. 会计研究, 7: 73~78

王兵,辛清泉,杨德明. 2009. 审计师声誉影响股票定价吗?——来自IPO定价市场化的证据. 会计研究, 11: 73~96

张奇峰. 2005. 政府管制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吗?——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12: 14~23

朱红军,何贤杰,孙跃,吕伟. 2008. 市场在关注审计师的职业声誉吗?基于“科龙电器事件”的经验与启示. 审计研究, 4: 44~52

Brian W. Mayhew. 2001. Auditor Reputation Build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9 (3): 599~617

Don M. Autore, Randall S. Billingsley, Meir I. Schneller. 2009.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and Auditor Reput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3 (2): 183~192

Douglas J. Skinner, Suraj Srinivasan. 2010. Audit Quality and Auditor Reput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10~15

Jere R. Francis, Kenneth. Francis, Dechun Wang. 2005. The Pricing of National and City-Specific Reputations for Industry Expertise in the U.S. Audit Market. The Accounting Review, 80 (1): 113~136

Joseph Weber, Michael Willen Borg, Jieying Zhang. 2008. Does Auditor Reputation Matter? The case of KPMG Germany and ComROAD A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6 (4): 941~972

Karen K. Nelson, Richard A. Price, Brian R. Rooftree. 2008. The Market Reaction to Arthur Andersen's shredding of Documents: Loss of Reputation or Confounding Effec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6 (2): 279~293

Kiridaran Kanagaretnam, Chee Yeow Lim, Gerald J. Lobo. 2010. Auditor Reputat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4 (10): 2318~2327

Paul K. Chaney, Kirk L. Philipich. 2002. Shredded Reputation: The Cost of Audit Fail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0 (4): 1221~1245

Roger D. Huang, Hang Li. 2009. Does the Market Dole Out Collective Punish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dustry, Geography, and Arthur Andersen's Reput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3 (7): 1255~1265

Shingo Numata, Fumiko Takeda. 2010.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Audit Failure in Japan: The Case of Kanebo and ChuoAoyam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45 (2): 175~199

Srinivasan Krishnamurthy, Jian Zhou, Nan Zhou. 2006. Auditor Reputation, Auditor Independence, and the Stock ~ Market Impact of Andersen's Indictment on Its Client Firm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3 (2): 465~490

Steven F. Cahan, David Emanuel, Jerry Sun. 2009. Are the Reputations of the Large Accounting Firms Really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the Andersen Enron Affair.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8 (2): 199~226

Yan min Gao, Karim Jamal, Qiliang Liu, Le Luo. 2010. Does Reputation Discipline Big 4 Audit Firms? in: CAAA, CAAA Annual Conference 2011.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during 2003 – 2009 , we find that credit frictions affect the capital structure , indeed. The adjustment of capital structure provide proof that the bank lending channel theory and quantity rationing work reasonably well when tighten money policy executed. However , credit analysis is not supported when policy is loose. This research would have pragmatic implication to explain financing decision , to enforce the monetary policy , and to regulate financial systems.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troduced by Banks as Credi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Guangdong

Wang Mansi & Shao Guoliang

Taking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more market – oriented areas , Guangdong , as samples , which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data are used as evidences , and grouping the bank debts as short – term debts and long – term debts , the listed companies as private and state – owned on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anks still has not been exploit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 and though in recent years , bank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ir financial constraints to companies , however , financial constraints are still just a simple mechanism , which might further exacerbate the problem of corporate finance , and banks and enterprises cannot truly win – win. Some new discoveries also has been gotten in the research , those especially such as Bank debt’s soft constraints in state – owned companies’ financial value and in private companies’ market value , and when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 the bank debt showed a more favorable 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the private company , but the opposite of which on the state – owned companies.

Exploring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Research Group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 Finan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CS) aims to resolve the humanity assumption for ICS. The current theory of internal control is purposely or goal – oriented , while lack of deeply study of the humanity basis. As for the building of internal control theory , humanity basis is more decisive than purpose or goa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humanity basis of internal control can be mainly expressed as human being’s relentless pursuit for rationality and its self – coordin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secular obligations , thus which determines the Leviathan theory and rational theory have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ICS.

COSO Framework: New Development and Review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Exposure Draft on IC – IF

Lin Bin et 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new development in the COSO Exposure Draft (ED) on Internal Control – Integrated Framework which was initiated at 2010 and was released on 19th , Dec. , 2011. Compared to the former framework , there are substantial changes in ED , such as applying a principles – based approach , expanding the category of reporting objectives , and making adjustments to accommodate change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in COSO framework will be presented. We also analyze and give some comments on it , aiming to provide some advi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control in China.

On Auditor Reput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s

Wang Fan & Zhang Longping

Abstract: Auditor’s reputation is themotivation for auditors to maintain independent. The study on auditor reputation gradually increased after Enron in 2001 which led to widespread concern. Existing literatures in such field mainly study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 role , damaging and recovering mechanisms of auditor reputation. Specifically , regulation ,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 audit quality , media and law ar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of anditor reputation. And the auditor’s reputation can help auditors to remain independent , improve audit quality and fees. The damage of auditor reputation will lead to some corresponding market reac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s , but also give birth to the corresponding recover problems. This review help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auditor’s reputation and could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o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Attribution of National Audi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System

Ma Zhijuan & Liu Shilin

The essential attribution of audi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question. In the ongoing government reform , the departure model of decision ,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has raised. The imbalance of these three sets of power is the reason why the audit lacks of independence. So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system power to make an ideal model. Audit’s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national audit.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audit is firstly checks and balances support system and then audit plays the role of balancing in the way of information system. The essential attribution of national audit is power – balance information system.